

试论郑观应的教育思想

管 林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地主阶级有识人士,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要求改革吏治和向西方学习,萌发了最初的改良主义思想。洋务运动的兴起,把向西方学习从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逐步发展。这期间,通过京师同文馆等机构出版翻译著作,驻外使节、出访考察使团、留学生等介绍情况,使有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所加深,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同西方的一些差距。他们提出在不改革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从而形成了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吏治,设立议院;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富国强兵,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特别是郑观应,曾明确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将改革教育与改革吏治作为整个改革方案的两个基本点。他们都认为,要实现改革,必须有一批掌握西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不是空疏的封建传统教育所能胜任的,因而得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主张。本文拟就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的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加评述。

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实业家、诗文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可归纳为下述六个方面。

(一) 重视学校教育,反对科举帖括之学。

他在著述中,曾反复论述学校教育的重要。他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

故泰西之强于学,非强于人也”。(《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所引,均出自该书。以下只称某册第几页。)
“国家自强之道首重武备,人才之兴在于学校。”(《稟醇亲王、督办粤防彭宫保、两广总督张制军、北洋大臣李傅相设水陆学堂节略》,下册第171页。)
“国家之盛衰,系于人才,人才之优劣,出于学校。”(《上督办京师大学堂孙相国书》,下册第177页。)
“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致伍秩庸先生书》,下册第270页。)
所以,他把学校看成是:“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学校上》,上册第265页。)
而要兴学校,就必须废除科举帖括之学。他认为“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格,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论考试》,上册第104页。)
这种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情况,求富图强的真正人才自然难以产生。所以,他提出:“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才,开诚布公,与民更始。”(《教养》,上册第481-482页。)
认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上册第216页。)

(二) 倡导职业技术教育,建议设立实业学堂。

他认为“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否则终身习之而莫能尽其巧。”“英国伦敦设有工匠学堂,以为工技之

成，弟子每不能及师，不免每况愈下，故令学工艺者先读工程专书，研究机器之理，然后各就所业，日新月异，不独与师异曲同工，且变化神明，进而益上。”“苟专设艺学一科，延聘各师，广开艺院，先选已通西人算法者学习，读书、学艺两而化，亦一而神，则小可开工商之源，大可济国家之用。”（《技艺》，上册第719-720页。）他指出：“当此竞争之世，非富不能强，欲富必先研究实学。”（《致潘兰史征君书》，下册第383页。）“国家欲振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之才。”（《商务五》，上册第626页。）他曾具体建议：“如欲振兴工艺，必须各省均设实业学堂，兼置机器，选各省俊颖子弟，年二十左右、通中外文字算法者数十人，聘外洋专门工师，分类教习。”这样，数年以后，“自然人才日多。将来开矿、造路、铸炮、装船，精益求精，技艺日巧矣。”（《拟创设工艺书院机器厂节略》，下册第174-175页。）

（三）主张设置女学，关注家庭教育与幼儿教育。

他指出：“世人只知男子不读书吃亏，不知妇女不读书，孤陋寡闻，吃亏更大。”“妇人失教不知书理，其所生子女故不知教育之法。富家子多是纨绔，贫家子鲜知貌，非失于宽即失于严。”“甚至有家训过严，不知循循善诱，动辄打骂恐吓者。岂不知恐吓多即致病，病多即体弱，安能延年？人怪其死于医药之不灵，未知其父母保护之不善也。”“若其母知书识礼，必常依依膝下，事事教导，受益良多。”所以，他认为：“教子婴孩，家庭教育最关重要。”（《复蔡毅若观察书》，下册第201-202页。）他还指出：世界上“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盛，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因而提出：“女学校乃当今急务救本之基。”（《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下册第263-264页。）把女学、家教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地位上来认识，对幼儿教育，他也特别重视。他说：“我国而欲与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舞台，而不亟思讲求教育，不可也。讲求教育，学有专门，而不自幼童始，尤不可也。”（《与月岩四弟书》，下册第242页。）他还联系自己的经历和家庭实际，来进一步阐明幼儿教育的重要。他说：“前游日本幼儿院参观，见四五岁小儿均循循有礼，互相亲爱，而且居处得法，看护有方，各遂其生，各适其性，

尤易于抚养。因忆余前所生之儿，两经幼殇，皆由无幼稚院教育而家庭不晓卫生、仆妇不善抚养所致”。（《与月岩四弟书》，下册第242页。）

（四）强调师范教育，培养新型师资。

他认为“培植之责任在于公学，而人才之优劣出于教员”。所聘教员应是“硕学通儒”，“能诲人不倦，循循善诱，非但教育有方，且于世界最新之学校卫生诸法靡不美备精详。”（《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公宴校长诸君颂辞》，下册第261页。）他指出当时“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材。故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帖括之艺。试问以五洲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学校下》，上册第269页。）这样的教师，怎能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为了造就人才，办好学校。他认为必须向日本学习，重视师范教育。他说：“日本致强，一由政治，一由水、陆军，而其母则在学校。学校之母又在师范。范方则方，范圆则圆。不善不可为陶冶，故陶冶国民必以师范为基础。”

（《致潘君兰史述马君相伯考察日本学务书》，下册第222-223页）。对于新型师资，他还要求懂得教学规律和掌握有效的教学方法。他提出教师“宜判其难易浅深，使学者循序渐进。”“幼童善记，则宜导之记；成童善悟，则宜引之悟。”“师长应以善心劝化勉励。如非万不得已，则不可加责，亦须有威可畏，令其不敢轻视。”“教法宜简，品行宜端，宜令诸生仰体师意，慕其教法。”“勉励诸生，鼓舞前进，赏赐之法，宜斟酌而行。盖天资优者得赏必多，或生骄忽之心。天资劣者徒劳无功，或生怠忽之心。当令各生徒因此赏赐，发奋前进，其功自不容已也。”“小过宜以婉言导之，大过当以法语绳之。”（《待鹤斋学校论》，下册第203-208页）。

（五）鼓吹道德教育，提倡身体健康。

他认为“道德者人民之要素也，国家之元气也，世界竞争之战利品也。”（《与潘君兰史、何君闳樵论选举参议院议员宜先注重道德》，下册第322页）他说：“至于道德实为治国之精神。无典章、法律、兵舰、军械不足以治国，即有典章、法律、兵舰、军械及一切种种设施制造，而无道德以贯注之，虽能致富强于一时，而不能享幸福于永久。盖长治久安之策，非道德无以植其基，中外无二理也。”因此，“可知有道德之国则兴，无道德之国则亡，历观中外圣哲言及历史，

其例有不爽者。”（《与梁君纶卿书》，下册第415页。）鉴于此，他特别鼓吹道德教育，提出“学校者人才之所出。然人才重人品尤重，必不为财色所困，若徒养成无品之人才，不如无才之为愈。”（《答杨君绍伯、梁君敬若、何群樵书》，下册第252页。）他认为“日本与欧美各国人民，均知爱国，上下一心，实缘童蒙入塾教化得法。尝考其小学课本，编有杀身成仁、爱国救人诸故事。无论贫富贵贱、老幼男女，皆有浅文诵读，入于耳而根于心，故得令其心思振奋。”（《致家塾潘教习论朱星源小、大学书》，下册第211页。）对于道德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应该落实到行动中，而且要面向社会、联系实际来进行。“修身之方重在躬行实践，而非徒托空谈，日本所以有作法之举也。作法之大要乃举社会交际行动各种现象，一实地演习。”（致香山自治会节录阳湖伍君达拟筹备宪政改良教育小学章程》，下册第266页）他认为“小学堂向无算学，亦无体操，以致读书人体多文弱，腰多不直，教法亦未完备。”主张“仿照西法，算学、体操万不可缺，并改体操如兵操，步伐整齐，不独有益卫生，亦可备日后当兵之用也。”（前第236页）平时，他也常告诫儿子，要重视身体健康，“不论何事不可过劳，故君子时中，小人反中庸。日间办事亦须有定期：如早起体操，或行易筋经，或十二段锦，均不可断间，馀暇缓步草铺上或海边上，吸受清风；早饭后入公事房办事；到午时中饭后，静坐片时，收视返听于气海，……晚饭后复散步、体操、静坐时就寝。”（《训长男润林并寄月岩弟》，下册第1181页。）

（六）介绍西方学校制度，设想建立中国近代学制。

郑观应较早地注意到了学制问题，在《易言·西学》中，他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学校制度。“其学堂自乡而城、而郡、而都，各有层次。”各地分设乡塾，男女不分贵贱，自七、八岁起都必须入学，至15岁为小成。乡塾为义务教育阶段。乡塾之上有郡学院、实学院、仕学院、大学院，各成系统而相互衔接。他较为详细地介绍乡塾教学的组织形式：“塾中分十余班，考其勤惰以为升降，而实学院有上、下，分13班，考工计程以定进止”，给人们描绘了班级制度的基本特征。他还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西方学校课程，并把它归纳为经学、法学、智学、医学四大类。在《盛世危言》中，专设《学校》上、下篇，并以《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

为附论，着重介绍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从学制的性质、任务、学习年限、课程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法，以及各国教育的发展概况，都有详细论述，并进而把西学学制归纳为以三级普通教育为主干，含有普通、专门两大部类的学校教育系统。他认为：“夫制无分今古，法无论中西，苟有益于民，有利于国者，行之可也。”（《邮政上》，上册第670页。）他根据自己对西方学制的认识，根据“有益于民”、“有利于国”的原则，对西方学制加以“变通”，提出了建立中国近代学制的要求和建议。他主张仿照西方的学制，设立分高、中、初三等，包括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军事教育等在内的完整的学校系统。他主张在京师设大学，在省设中学，在县设小学，在各乡设私塾。大、中、小学均采用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以考试的结果为升级的标准。鉴于不同国情，他提出了“变通”的具体办法，即将中国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功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并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是我国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参阅《学校上》、《学校下》，上册第265-271页；《考试下》，上册第299-300页。）

以上六点，是郑观应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在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下，在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教育现象与问题的认识和看法。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是他那个时代作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对教育与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作为早期改良派的郑观应，是属于没有什么权势的知识分子，在教育实践方面并无惊人的作为，如果仅从教育发展的现实结果来看，与洋务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实践相比，确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他在实践中具体做了些什么，还要看他为实践提供了些什么。实际上，在社会变革特别是新旧交替之际思想启蒙的历史意义，往往与实践同样重要甚至还在实践之上，否则就很难理解在维新运动期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被进呈光绪皇帝御览，受到维新志士广泛重视这一历史事实。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是他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的社会改良思想的重要性组成部分。他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对改革教育的强烈要求，对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师范教育的关注，在经营近代工商业实践中，一贯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近代学制的倡导，给近代中国思想以积极影响，对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